

東歐局勢概觀

尹慶耀

近幾個月來，舉世注目的東歐局勢，雖然出現過一些驚險鏡頭，假如蘇俄和某些東歐國家，不愚蠢到對捷克去實行武裝干涉，一場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式的反俄反共抗暴革命，或許不至於馬上爆發。可是，目前的動盪即使可以暫告平息，那也并不表示蘇俄和東歐的一些共產政權，就可從此高枕無憂。概括的說來，在波濤起伏的東歐動亂中，存在着兩種基本的傾向：其一是「自主化」，其二是「民主化」。

所謂「自主化」，并非馬上要脫離蘇俄集團而走向自由陣營。它只是把國家利益擺在集團利益之上，要求自主的決定其內外政策，而不唯唯諾諾惟集團——其實是蘇俄之馬首是瞻。但即使如此，也會削弱蘇俄對東歐的控制。尤其嚴重的是，這種「自主化」的一些行動，必然會觸發東歐人民密藏在心底的反俄情緒。

所謂「民主化」，是「社會主義民主化」，它有一定的範圍與尺度，不能與自由世界的民主相提並論。但即使如此，也足夠使若干共產政權惴惴不安，深恐密藏在人民心底的反共情緒，會趁着那不完全的「民主化」的激流，沖毀共黨統治的堤防。而共產國家的「民主化」，常常假反史之名以行，反史反到最後，又必然和反俄聯繫在一起。

面對着目前東歐的動亂，蘇俄始而慎重，繼而焦急，終而有些手忙腳亂，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它將是這場動亂中，最大的受害者。

東歐的共產國家，都是經由史達林之手成立的。他在那裏從事過領土據佔、經濟掠奪、政治壓迫、血腥屠殺……。東歐各國的共黨政權，在當時都是莫斯科之不折不扣的傀儡，是蘇俄在各該國從事搜刮和鎮壓反抗的工具，稍有民族主義嫌疑的共幹，都會遭受殘酷的整肅。各國共黨政權不敢反抗，東歐人民也表面屈服於暴力之下。然而，那裏實際上已潛伏着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危機。史達林一死，東歐立即就呈現了不安。

爲了緩和那些危機，東歐各國共黨，都想發展其國民經濟，某種程度的改善其人民的生活，有有限的放寬「民主」尺度，改變其本身與人民尖銳對立的現狀，以鞏固其統治地位。於是所謂「自主化」「民主化」的傾向於以誕生，因此也就不甘永處於附庸的地位。

黑魯曉夫沒有史達林那樣高的權威，無力阻止東歐的上述傾向。於是他想透過「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國際分工專業化，加強東歐各國對蘇俄的經濟依賴；透過華沙公約組織，加強東歐各國對蘇俄的軍事依賴。利用這兩條紐帶，束緊那個赤色帝國。

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和包戈尼「三頭馬車」的新政權，在國際間的地位更不及黑魯曉夫，就越發依賴那兩種機構，作爲控制東歐的主要工具。而目前，在東歐動亂中，首先遭受威脅的就是此二者。它們在東歐「自主化」及「民主化」的衝擊下，已經搖搖欲墜了。可是，蘇俄對此，顯然不能作有效的阻止。

另一方面，東歐各國爲了克服當前的經濟困難，對內不能不起用一些高級的學者專家，容許他們多多發表意見，因而需要放寬一些「民主」的尺度；對外不能不實行經濟外交，因而不能處處聽命蘇俄。換言之，它們的「自主化」和「民主化」，是實逼處此，不得不然。可是，一個共黨政權，既不可能完全與蘇俄脫離關係，也不可能無限制放寬「民主」的尺度。而一般人民的要求，也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共黨所限制的尺度之內。這種矛盾是永遠無法解開的，因之反俄反共的暗流，也是永遠不會中止的。

二

所謂「自主化」與「民主化」的傾向，在東歐各國的表現，也不盡相同。除去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亞現今都不是「經互會」和華沙公約成員國，不予論列外。「自主化」和「民主化」的先進，是波蘭和匈牙利。波共頭目戈慕卡於一九五六年被釋出獄再度上台，實係以此二者爲背景。然而進入一九六〇

年代後，戈慕卡却因事實所迫，走向相反的道路。匈共頭目卡達爾，也曾以民族主義罪嫌被捕入獄。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抗暴事件初期，他於同月二十五日任匈共第一書記，兩天後任納吉政府的國務部長，當時曾力主俄軍撤離匈境，他說：「我們不願意再依賴人家」。可是，事件一發展到反共抗暴時，他就於十一月二日秘密赴俄，請求俄軍入匈鎮壓人民的反共革命。不過，他在國內作出了一些就共產集團來說是「民主化」的措施。

羅馬尼亞起步較遲，却成為「自主化」的代表者。但它迄今仍是一個警察國家，「民主化」只是放在口頭上，其尺度是最嚴刻的。保加利亞是蘇俄的忠實僕從，但最近也吵着要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東歐，業已下台的捷共頭目諾沃特尼和尚在台上的東德頭目烏布里希，是兩個老牌的史達林主義者，對內實行恐怖統治，對外追隨蘇俄的政策。一九六四年七月，黑魯曉夫之婿阿祖培訪問波昂，黑某有繼之往訪之說，東德深感不安。同年十月六日，烏布里希在東德成立十五週年紀念大會演說，聲言不打算把東德出賣，並且說「從來沒有把自己的國家變成某一個國家的附庸」。可是，這個缺少脊椎骨的共黨政權，離開蘇俄的支持就站不起來，因此它迄今仍是十足的蘇俄附庸。

在諾沃特尼的統治下，捷克的反史運動開展得最遲緩。但他一經推倒，捷克就成為「自主化」和「民主化」的急先鋒。

談到最近的東歐動亂時，應從羅馬尼亞說起。它在「經互會」和華沙公約組織中，都是反對派。它因不滿「經互會」的國際分工使它永處於農業國的地位，乃於一九六〇年六月，逕自決定全面工業化。一九六三年七月，又反對黑魯曉夫在「經互會」內設超國家權力機構的提議。一九六四年四月，在羅共機關報「火花報」發表「主權宣言」，宣稱有向獨自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權利。一九六七年八月，它的新憲法上規定對外關係原則為：尊重主權、民族獨立、平等互惠、不干涉內政。

當東西歐局勢表面稍趨緩和時，蘇俄擬趁機在歐洲驅逐美國勢力而孤立西德，同時加強其華沙公約組織。一九六六年七月，華約組織在羅京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其「關於加強歐洲和平與安全宣言」中，有：（一）必須防止西德取得核武器；（二）必須承認歐洲國家現在的疆界（指西德與波蘭的奧得—尼西線，及東西德邊界）；（三）和平解決德國問題，必須承認東西德之存

在。一般認為上述各點，為東歐各國與西德接近的先決條件。惟羅馬尼亞為求本身經濟發展，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底與西德正式建交，而置上述條件於不顧。此事引起東德及波蘭之抨擊，但據傳捷、匈、保等，當時均擬步羅後塵。蘇俄在慌忙中急謀補救，乃於同年二月初在華沙召開華沙公約國外長會議，羅外長莫耐斯庫（C. Manescu）以訪問比利時為由未曾參加，但他在布魯塞爾公開發言：「集團主義等等，業已落伍」。會後在蘇俄的壓力下，捷、波和東德於三月間互締「友好互助條約」，組成鐵三角。匈牙利於五月十八日，保加利亞於九月七日，先後與東德簽訂同樣條約。

一九六七年六月初，中東戰事爆發，蘇俄於九日召集東歐各國首腦，在莫斯科舉行會議，商討如何支援阿拉伯、譴責以色列，羅馬尼亞出席會議，但拒絕在聲明上簽字。七月中旬在布達佩斯再度開會時，羅即不參加。蘇俄利用中東動亂伸張勢力，對其世界霸權之爭奪當有裨益。惟羅馬尼亞於同年四月十六日，與以色列簽訂貿易協定，決將雙方貿易額增高十倍，不少以國專家，正為羅馬尼亞的工廠安裝機器設備，從事技術指導，自不願效顰其盟國而對以絕交。同年七月二十四日，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N. Ceausescu）在國會演說，承認以色列有抵抗的權利。東歐各國共黨中，有不少猶裔幹部，對其本黨政權追隨蘇俄，支持在國內拘捕共產黨員的納塞而反以色列，本已表示不滿，羅馬尼亞的態度，更給他們以極大鼓舞。

在匪俄鬥爭中，羅共向守中立。它未曾參加一九六五年三月的莫斯科協商會晤，杯葛了一九六七年四月在捷克舉行的全歐洲共黨會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在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共黨協商會晤，羅共派遣代表團出席，這對蘇俄重新團結國際共黨的努力說來，是一項成功。但在會中，蘇俄、波蘭等共黨破壞事前的默契，公開攻擊共匪。東德共黨未指名攻擊羅共的對外政策，敘利亞共黨指名攻擊羅共在中東問題中的立場。於是羅共憤而退出會晤，這成為蘇俄的一大失敗。

三月六、七兩日，華約首腦集會索非亞，布里茲涅夫及柯錫金於出席會議時，特往布加勒斯特會晤羅共首領，會議并由羅共任主席，但羅共仍拒絕支持蘇俄所提出的禁止核武器擴散草案。

三

另一個事件是波蘭學生的大示威。這次事件是因為波共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底禁演「祖先」一劇，并處分當事學生而引起。該劇乃十九世紀波蘭大詩人米基維茨(Adam Bernard Mickiewicz)所作。米氏生前立意將波蘭文學從法國古典作風之下，轉移於拜倫(George Byron)及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等英德詩人影響下，建立波蘭的、國民的浪漫主義文學。生前因民族主義思想，被俄人強制移居俄國，在莫斯科得結識普希金(A. S. Pushkin)，後又赴德國威瑪訪問歌德。其作品除詩集外，尚有小說、戲劇等等。「祖先」一劇實為反俄劇本，劇中如「我們波蘭人爲了幾個盧布就把我們的靈魂出賣了」，「莫斯科送給我們的東西，只是笨驢、白癡與間諜」等詞句，頗爲觀眾所激賞。該劇上演時座無虛席，很多波蘭戲劇界名人特由國外趕回欣賞。波共深恐釀成一場反俄反共風暴，因而將之禁演，遂引起學生遊行示威，且與警察發生鬥毆。

戈慕卡對付學生示威，採取：(一)孤立——發動工人反示威，企圖使羣衆與學生對立，惟效果不佳；(二)高壓——懲處學生、家長、官員、教授等等。據三月十九日戈慕卡演說中稱，當時業已拘捕一、二〇八人，其中學生三六七人；判刑二〇七人，其中學生六七人。此後當有所增加。(三)轉移目標——變反俄爲反猶，被免職官員中多爲猶裔。

按當年匈牙利反共抗暴革命，乃一全民性的羣衆運動，其陸軍且曾將若干武器分發給示威羣衆。波共採取上述種種措施，即防匈牙利事件在波重演。然學潮雖暫告壓平，亦將成爲永不熄滅之火山口。

一九五六年十月，戈慕卡以民族主義者姿態，允予人民較多自由而再度登台。現已自食諾言，其威信大受損傷。今年三月十九日，戈慕卡在華沙對波共黨員中三千積極份子講話，其要點爲：(一)華沙青年學生有一大部分被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所欺騙走上歧路，該勢力在學生間撒下冒險的無政府主義和違法的種子；(二)最近各項事件，乃由華沙大學內極少數科學研究者所引起；(三)不與蘇俄聯盟，則波蘭西部領土的防衛、和西德帝國主義相對抗以及作爲一個獨立國家而繼續存在(五月一日勞動節時，戈又作同樣發言)，均屬不可能；(四)中東戰爭之際，部分猶太人希望支持以色列。我們的國境永遠爲那些不願作波蘭國民而希望前往以色列的人敞開，誰要想以以色列爲祖國，可隨時給予出境簽證。

由戈慕卡的演說，可以察知示威學生并非完全孤立，實際有很多人在暗中支持。在被整肅的知識份子中，包括若干教授，兩位核子科學家，甚至其科學院社會科學部部長，同時是波共中委的佐爾凱夫斯基(Zolkievsky)也被免職。政府官吏被免職的有森林部次長、財政部祕書長、華沙工業計劃局長等等，還有曾任政治局委員爲波共理論家之一的國家檢查委員會副主席桑布洛夫斯基。同時軍中也有四名將領被調動，其中三名失去了軍隊指揮權。

最值得注意的是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奧哈布(Edward Ochab)的辭職。他自從一九五六年三月當時波共頭目貝魯特(Boleslaw Bierut)客死莫斯科後，就接任第一書記，四月間他把戈慕卡釋放出獄，八月間准戈慕卡再入黨，十月間協助他當選第一書記，自己退居現職，二人一向合作。在此次學潮中，奧哈布的女兒爲主要份子之一，又奧素有眼疾，但這些都不足以構成必須在此時辭職的理由，其最大可能，乃是他與戈慕卡之間已有歧見。而他的繼任者前國防部長斯彼哈爾斯基(Marian Spychalsky)，則是戈慕卡的支持者。此外，總理西倫凱維茨(Jozef Cyrankiewicz)及外長臘帕茨基(Adam Rapacki)亦有行將辭職之說。

上述的整肅事件，反映了波共內部是如何分歧。又波報自稱今年頭三個月內，波共開除了八、三五一名黨員，這些不見得和學潮有關，但也反映了波共本身頗不堅強。

蘇俄對波蘭事件初不作聲，三月二十二日「真理報」刊載了十九日戈慕卡演說全文。四月二十一日，俄駐波大使阿里斯托夫(A. B. Aristov)出席「蘇波友好條約」成立二十三週年紀念時發表演說，支持波共政權對學潮的處置。這些，實際上只會加深波人對蘇俄的仇恨，并降低戈慕卡的地位。

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捷克已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且以擁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經理人才自誇。又自馬薩里克(Thomas Garrigue Masaryk)博士開國以來，捷克就是一個民主國家，其副手貝奈斯(Eduard Benes)，也是民主政治的彗星。但從赤化後，蘇俄式高度中央集權的共黨獨裁，扼殺了捷克的民主主義；蘇俄式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制度，也扼殺了一切經濟事業的生機。當年貝奈斯總統和外長馬薩里克(Jan Masaryk)乃老馬薩里

克之子）曾擬參加西歐的馬歇爾計劃，因蘇俄阻止而作罷，外長馬薩里克因此遇害。為對抗馬歇爾計劃，蘇俄提出「莫洛托夫計劃」，那就是以後的「經濟互助委員會」。

一九四八年二月政變後，捷克完全赤化。其經濟困難則日甚一日。一九五八年，捷克就倡議經濟改革，其設計人為捷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奧塔·錫克（Ota Sik）。但改革案并未認真實行。一九六二、六三年，捷克經濟情形連續惡化，一九六三年捷共大會就決定實行改革，一九六五年一月又發表經濟改革案，設計人仍為錫克教授。改革案雖經捷共中央決議，自一九六六年起實施，嗣後延至一九六七年開始，但第一書記諾沃特尼以下的保守份子，多方牽掣。

這不徹底的改革使得經濟情形惡化，人民生活水準降低，更引起多數人對諾沃特尼的史達林主義作風及向蘇俄一面倒的立場，深表不滿。首先對政府加以抨擊的是以作家協會為代表的知識份子，諾沃特尼仍以高壓手段，對作家逮捕判刑。一九六七年九月捷共中央全會中，將作協的三位作家開除黨籍，又把作協機關雜誌「文學報」移歸文化部管轄，遂引起十月間布拉格查理士大學學生示威，諾沃特尼調動警察鎮壓，越發招致人民反對，黨內的批判勢力也隨之高漲。

一九六七年十月捷共中央全會中，諾沃特尼與當時任斯洛伐克共黨第一書記的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cek）正面衝突，全會中止，定十一月再開。諾曾擬於此期間撤免杜布契克的職務未遂，反招致更大反對，遂將全會延至十二月。十二月八日布里茲涅夫抵布拉格，惟未能挽救諾沃特尼失敗命運。同月十九日，捷共中全會恢復舉行，因有人提議諾沃特尼辭職，二十日再度中止，延至一九六八年一月舉行。一月三日至五日全會召開期間，諾知大勢已去，乃於五日辭第一書記，專任在共產黨內并無實權的總統一職。

諾沃特尼於一九五三年出任第一書記，一九五七年起兼任總統，在黨、政、軍隊及工會幹部中，仍有不少擁護者。杜布契克所憑藉者為黨內主張經濟改革的革新派，及知識份子的支持，乃於三月五日廢除新聞檢查制度，提高輿論威勢以壓倒諾派。三月六日，捷國防部政治官員塞納（Jan Seina）少將逃美消息公佈，他是諾沃特尼的心腹，於七年間由少尉升至少將，在任時有不少貪污劣跡。他的出走，據傳係擬於一月間發動軍事政變未成，由諾

沃特尼協助其逃亡。消息一經傳出，全國輿論大譁。三月十四日國防部長克自殺，十五日內政部長及總檢察長辭職，而諾沃特尼的得力助手、政治局委員、書記、思想理論委員會主席亨德利赫（Jiri Hendrych）也已辭職。保守派人物相繼失勢，諾沃特尼本人也於同月二十二日被迫辭去總統職務。三月廿八日，諾沃特尼辭政治局委員。三十日史沃波達（Ludvik Svoboda）當選總統。四月五日切爾尼克（Oldřich Černík 原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代勒納爾特（Josef Lenárt）為總理。四月八日，史沃波達發表新聞名單，重要部長均已更換。十日晨，捷共發表「行動綱領」，其內容可資注意者，有下述各點：

一、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及國外旅行、居留之自由，惟國家有阻止專家人才外流的權限。

二、制定新聞法，明文規定對新聞、廣播、電視的限制範圍。

三、審判由政治獨立，恢復過去遭不法整肅者之名譽，并予以補償金。

四、將國家保安機關分為兩個獨立部門，其一防止外國敵人進行破壞，其二維持國內治安與公共秩序。

五、修訂選舉法，實行更有力的議會制度。

六、承認兩個德國的存在，支持西德內部的現實主義勢力，但反對其新納粹主義及報復主義的傾向。

七、與蘇俄及其他共產黨全面合作，惟強調「民族主權、獨立、平等」等原則。

八、在經濟領域內，承認正常的市場運營，成立合理的價格機構。

十一日杜布契克在捷共「紅色權利報」上警告說：「民主主義并不意味着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加干涉，可以任所欲為的無政府狀態」。二十日，他對斯洛伐克西部的黨員講演時說，共產黨以外的政黨，只能在共黨領導下的民族陣線範圍內活動。他明白表示，不准有在野黨成立。這是所謂「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範圍。

自捷克廢止新聞檢查後，各報章雜誌、廣播電視難免有過激言論，未必能代表其黨政領導首腦部的意見。但捷克要想在經濟方面尋求活路，就必須貫徹其經濟改革。新任總理切爾尼克為經濟改革派，而經濟改革的設計人錫克教授，也成為新任五個副總統之一，在人事配備上也可看出捷克實行經濟

改革的決心。要求經濟改革有效，非僅在計劃管理制度方面有所變更即可，更必須在內外政策上予以配合。因此：(一)要引進西方的資金與技術，實行經濟外交，有條件地改善對西方的關係。(二)引用高級知識份子，甚至包括黨外的技術專家，因而不得不放寬「民主」的尺度。

此外，捷克內部保守派份子尚未完全清除，最近各工廠中曾發現「不容許資本主義復辟」的小冊子，而捷共一一一名中委中，尚有四十名保守份子，因此新領導不能中止以「民主化」為鬥爭武器。

為此，四月二十四日切爾尼克總理在國民議會中報告稱，以「行動綱領」為基礎的「民主化」措施，正在準備中。他說捷克產業不能滿足國外貿易和國內消費的需要，因此政府準備向西方借款。他又透露今後五年至七年內，將實現捷幣克朗(Koruna)的交換性。他甚至提到要恢復民主主義的傳統。以上種種，就引起蘇俄及若干東歐國家的焦慮。

五

東歐各國對於捷克政潮，反應不一。

南斯拉夫同情捷克的「民主化」(南知識份子曾抗議波蘭迫害文化人)，羅馬尼亞也支持捷克的「自主化」，它對捷克「自主化」傾向報導最詳。但羅對捷的「民主化」不能不有所警惕。三月廿三日羅共總書記聲稱：羅馬尼亞人對共黨政策，均可自由發表意見。且稱自一九六五年起，羅即開始清除「對社會主義有極大損害的保守傾向」。四月二十六日，免除了前內政部長德勒吉奇(Alexandru Drăghici)的中委職務。同時對已故羅共頭目喬治烏—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鞭屍，說過去的不法判刑，應由他負責。

匈牙利電台曾於三月廿二日廣播，匈全境正實行軍事大演習。那是多年來不曾有的事，很可能和捷克事件有關。然而匈牙利對捷克「民主化」的態度十分微妙。匈牙利現有英文日報，經常採用西方通信社的新聞，塞納少將逃美的消息，在鐵幕內也是匈牙利首先報導。同月廿六日夜，匈共政治局委員主管思想問題的科莫欽(Zoltan Komocsin)廣播稱，對捷克的「民主化」從「心底支持」。但他又率直地說，在「民主化」過程中，常會混雜有若干錯誤的、反社會主義的右翼傾向，捷克應學習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經驗，在同

保守反動的傾向鬥爭之同時，還要同夢想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者的右傾動向鬥，才能貫徹「民主化」運動。

五月八日蘇聯和四個東歐國家首腦在莫斯科會議，據傳俄、波、東德主張對捷實施政治、經濟制裁，但匈共頭目卡達爾稱：「匈牙利國內對捷克民主化寄予極大同情，如果採取強硬政策對付捷克，恐怕匈牙利內部也有麻煩」。制裁之議才因此作罷。

保共報紙鼓吹加強華沙公約組織，保共書記維爾切夫(Boris Velichev)則寄稿蘇俄「真理報」，謂任何「右傾機會主義的情景或傾向，對於共黨領導任務發生疑問者，即是對我們黨的疏遠」。

東歐各國中，對捷克政潮最感惶懼者為東德，烏布里希早已禁止東德人前往捷克旅行，甚至連反越戰示威都在禁止之列，足見其神經質。三月廿六日夜，東柏林舉行馬克思誕生一五〇週年紀念哲學家會議，烏之左右手政治局委員、書記庫·哈格(Kurt Hager)演說中稱：「西德歡迎捷克的改革，把它當作絕好的宣傳資料。他們頻頻引用斯穆爾科夫斯基(Josef Smrkovsky)的話，斯氏是西德帝國主義者的同夥，且曾被告發有案的」。斯穆爾科夫斯基在一九五〇年代大整肅期間，以「西德帝國主義的間諜」罪名被捕，險些被判死刑。在哈格演說當時為捷克森林、水利部長，且為總統候選人之一，現任捷國民議會議長。哈格的抨擊引起全體捷人的憤激，捷電台指為對「內政之不法干涉」，是「嚴重污辱」捷克國民的名譽。當時捷外長戴維德(Vaclav David)乃召東德駐捷大使嚴重抗議。

波蘭和東德相同，也害怕捷克終將與西德建交，使它們之間的「鐵三角」崩潰。而正在向反「民主化」方向前進的戈慕卡政權，於三月間就曾驅逐捷克的新聞記者，拒絕捷克學生入境。四月間布拉格傳出的消息稱，波蘭沒收入境的捷克報紙。五月初，波蘭透過其駐捷大使遞交備忘錄，抗議捷克報紙及政府高級官吏對波蘭的敵對態度。同月九日波共「人民論壇報」攻擊捷克內部的「反社會主義傾向」。

對捷克局勢最感焦灼不安的自然是蘇俄，最初它只是慎重地警惕，對羅、波、捷事件，一律不加報導。但進入三月以後，它的神經也隨着捷局的演變而趨於緊張。

蘇俄首先擔心的是「經互會」和華沙公約的前途，如果這些發生動搖，

它的赤色帝國就要瓦解了。於是，在三月十九日，就邀約切爾尼克（當時為副總理）和捷新任「人民軍」總政治部主任波比奇（Egid Pelech）少將訪俄。切爾尼克曾表示不退出「經互會」。同月廿二日蘇俄「紅星報」摘載波比奇的談話，亦稱「捷克將留在華沙公約組織內」。

三月廿三日，蘇俄邀集東歐六國首腦在東德的德勒斯登（Dresden）舉行緊急會議，會議公報稱在最近期間採具體措施，加強華沙公約及其武裝部隊，並為進一步提高經濟合作而召開高階層經濟會議。又提到當對歐洲安全保障問題交換意見時，特別注意到「增大的西德軍國主義、新納粹的活動及基辛加——布蘭德政權最近針對東德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採的措施」。公報又提到捷共會就其國內情形提出報告。按捷克報紙當時反對捷克黨政首腦與會。事後杜布契克對記者透露，那次會議是幾個黨發起的，會中對捷克「民主化」過程不會被反社會主義份子所利用，表示了若干懸念。

蘇俄內部正在壓抑知識份子，對青年作家逮捕判刑，而一九六七年六月捷克作家協會第四次大會中，因宣讀同年五月蘇俄作協第四次大會中被禁宣讀而偷運至國外的蘇俄作家索爾傑尼欽（A. I. Solzhenitsyn）的公開信，引起捷克作家更加高漲的反政府傾向，因而蘇俄對捷克的「民主化」，同樣的十分神經質。三月廿九日，布里茲涅夫在莫斯科共黨會議中，強調帝國主義者正依靠「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份子」來削弱共產黨內工人的團結。他警告蘇俄知識份子，不滿現狀將要受到懲罰。四月九、十兩日，俄共召開中央全會，原定討論農業問題，臨時却改為討論越南及東歐問題。那次全會決定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顯然是企圖對捷克的「民主化」浪潮，築起一道防波堤。

蘇俄對捷共新領導能不能始終控制局勢，不使「民主化」傾向動搖了共黨的統治，異常懸念，因此對於諾沃特尼的去職，深表惋惜。

三月廿二日夜，「塔斯社」對捷共中央勸告諾沃特尼辭去總統職務，僅加簡短報導，未加任何評論。同時却全文披露了諾沃特尼給國民議會的辭職信，他在信裏曾自詡其任內的功績。四月廿三日，杜布契克召蘇俄駐捷大使契爾沃年科（S. V. Chervonenko），告以「蘇俄如不中斷其與史達林主義派的諾沃特尼之間的緊密聯繫，則捷克新任駐俄大使茨茨基（Vladimir Koucky）將延期赴任」。當時傳說捷克已通知蘇俄，如不停止其對捷克內

政的干涉，則廿四日在布達佩斯開始舉行的世界共黨會議籌委會中，捷克代表團將行退出。

五月四日，杜布契克率高級代表團訪俄，五日發表的雙方首腦會談公報稱，雙方將在經濟、國際問題等各方面密切聯絡，但關於黨的活動僅稱「率直的同志般的交換了意見」。公報中提到為了今後兩國經濟合作的發展，成立經濟專家共同委員會。據傳蘇俄應捷克之請，允貸予硬幣四億美元，惟「塔斯社」關於杜布契克於七日在布拉格所作歸國後的報告，在報導中特別強調：（一）關於捷克的經濟合作方案，蘇俄將加以檢討再予回答。（二）蘇俄對捷克的反社會主義行為表示關懷，捷克也承認對俄關係的不安。六、七兩日捷新任外長海耶克（Jiri Havel）訪俄，解釋捷克的外交政策。同時，捷駐俄大使茨茨基也於六日到任。但八日，俄、波、東德、匈、保即在莫斯科舉行緊急首腦會議，當時盛傳將對捷制裁，但會議公報中仍然只有「交換意見」，看不到「意見一致」的字樣。

在俄捷關係中最惹人注目的是有關軍事干涉的報導。早在德勒斯登會議前後，就盛傳有俄軍四師集結捷克邊境附近，和東德軍隊聯合舉行示威性的演習。三月廿六日夜，布拉格電台廣播員即委婉地指責說：像九國共黨情報局開除南斯拉夫的時代已成過去。捷克選擇了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沒有從布達佩斯或德勒斯登會議中被開除。如果蘇聯想影響我們的「民主化」動向，最有效的辦法是派遣軍隊，那樣可以麻痺我們的經濟，使我們的經濟機構停止活動。五月九日左右，西方又傳波駐俄軍向捷邊移動，據目擊者報導稱確有其事，而且行軍時有直昇機在空中警戒。事後波蘭聲稱是軍事演習，但無疑的那也是向捷克示威。當日布拉格電台廣播稱：捷克革命的命運，現今和我們的朋友、同志、經濟合作者的寬容程度有關，我們的行動不一定都合乎他們的心意，但我們希望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悲劇不致在捷克重演。對於捷克的將來，我們自己負有責任。

按五月八日為捷克解放二十三週年紀念日，蘇俄曾派康涅夫（I. S. Konev）和莫斯卡連科（K. S. Moskalenko）兩元帥率團出席布拉格的紀念會。十七日俄國防部長格列奇科（A. A. Grechko）應邀訪捷。據傳他曾提議在捷克駐紮蘇俄及其他東歐國家的軍隊。此項消息尚未證實。果如此，那將是對捷克人的一項刺激。

捷共新領導在不完全排除諾沃特尼派保守勢力之前，不可能停止「民主化」傾向。而對過去不法整肅事件追根究底，又難免牽涉到蘇俄。四月十四日「紅色權利報」報導一九五一年捷共第一書記史蘭斯基(Rudolf Slansky)及前外長克里曼第斯(Vladimir Clementis)等被整肅，據當時的總檢察長稱，與蘇俄秘密警察有關。同月二十八日，捷「CTK」通信社報導前國家治安部長稱，當年蘇俄曾派米高揚(A. I. Mikoyan)赴捷主持此事。於是「蘇維埃俄羅斯報」及「塔斯社」共同還擊，稱捷克國父馬薩里克曾計劃暗殺列寧。這又引起捷克全國上下的一致憤怒。

五月十七日俄總理柯錫金以求醫為名訪捷，據傳雙方曾就解決捷克經濟問題加以討論，蘇俄對於捷克的「社會主義方向」也予以了解。柯此行或可稍稍緩和雙方緊張情勢。

六

捷克并未打算脫離蘇俄集團，但杜布契克早已表示國家利益優先，為了經濟需要，它可能向西方接近甚至可能與西德恢復正常關係。捷共決不會放棄共黨獨裁，但為了經濟改革，也為了排除保守勢力，它目前仍需要「民主化」。

五月九日即俄軍「解放」東歐紀念日，「真理報」揭載了捷克總統的論文，文中強調俄捷友好關係，同時又談到其國內的「民主化」，指責諾沃特尼時代的錯誤。而切爾尼克也公開說明，在五月四日俄捷首腦會談中，蘇俄表示不干涉捷克內政。不過，同月十日「消息報」稱「帝國主義者用盡一切手段削弱社會主義國家內勞動者的團結，其手段之一，即假民主主義與自由化之名，以打擊共產黨」。一方面承認捷共的現行政策，一方面警告不可作得過火，當係蘇俄目前對捷克的基本態度。

東歐國家中，波蘭及東德、保加利亞親俄，匈牙利并不如此堅定。而羅馬尼亞與捷克，將逐漸接近南斯拉夫。布拉格傳三國且有組織「小協約國」(在外交方面互相了解)的可能。

自一九六二年以降，阿爾巴尼亞事實上退出「經互會」和華沙公約。前者自一九六五年一、二月間第十九次大會之後，似乎并未舉行大會。後者在今年三月初索非亞會議時，有七個國家參加。三月下旬德勒斯登會議中未邀

羅馬尼亞，事後它曾提出抗議。五月八日莫斯科首腦會議，羅、捷均被除外。十七日，羅共總書記在歡迎戴高樂的集會中，重申其過去的主張，要求同時解散北約與華約，并撤退外國駐軍，但這次講話的意義，顯然已有所不同。

蘇俄約束東歐的兩條紐帶業已鬆弛了。不過，以東歐全體言，它們對蘇俄的貿易佔其總額的三〇—六〇%，就是羅馬尼亞，一九六七年的對俄貿易，尚佔其總額的三二%。東歐所需原料，七〇%來自蘇俄，尤其是捷克，它還要靠蘇俄供應糧食。固然，它的貿易可以轉向西方，但經過二十年的赤化，連捷克的工業技術也極端落伍，它的製品不易在西方求售，因而轉向也就困難了。另一方面，蘇俄也無力阻止東歐的「自主化」，它對南、匪、阿都實施過經濟制裁，結果更增強了離心力。對其他國家，也就不敢再輕易嘗試了。

捷克目前因外來壓力頗重，內部向心力強，其知識份子與政府立場一致。但共黨不會無限制放寬自由，其「民主化」有其限度。而且，現今其全國上下寄望於經濟改革，其「民主化」也是手段之一。但共產國家經濟的病根在其公有制的制度本身，制度既不可能改變，則一切改革均屬徒然。這是說諾沃特尼遭遇的困難依然存在。一旦新政權經改失敗，人民生活困難，就難免抱怨，而共黨政權勢須再度收緊自由政策，走上戈慕卡甚或是諾沃特尼的老路。且捷克具有深厚的民主主義傳統，當其知識份子再度與當局對立而爆發動亂時，問題的嚴重當更甚於今日。

捷克的「民主化」業已深刻影響到東歐的人心。波蘭一月底禁演「祖先」，學生示威却爆發於三月八日，顯受捷克影響，波蘭示威學生高呼「捷克萬歲」，而布拉格也有學生示威，聲援波蘭學生。設如未來捷克爆發同樣事件，其他各國難免受波及而響應。因此，東歐反俄反共的潛在危機是永遠存在的。

但是，我們願意指出，第一次大戰末期，德國大本營曾以密封火車把列寧送回俄國，且給予大量金錢要他回到俄國去「革命」。自從俄共政權成立，各國共黨攫取政權，都是由它給予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支援而僥倖得逞的。對於在共黨嚴密控制下的人民反俄反共抗暴革命，自由世界如僅僅袖手旁觀，是會延緩他們成功的時日的。